

大运河贯穿南北，连接古今，以运河为载体或者伴生的运河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文化标签——

文化视点

2020年全国图书零售市场
负增长

据新华社，北京开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基于全国1万余家实体书店和网上书店提供的采样数据，于近日发布《2020中国图书零售市场报告》。报告显示，2020年中国图书零售市场码洋规模为970.8亿元，同比下降5.08%，这是自2001年以来我国图书零售市场规模首次出现负增长。

报告显示，2015年至2019年，中国图书零售市场保持10%以上增速，2019年中国图书零售市场码洋规模约为1022.7亿元，2020年受到疫情影响首次出现负增长。从不同渠道来看，网店渠道的码洋规模为767.2亿元，增速7.27%，较前几年有所放缓；实体店渠道受疫情影响显著，降幅进一步扩大，同比下降33.8%。

从不同细分市场来看，整体零售市场中除主题出版、教辅教材、少儿图书保持正增长之外，其余门类均出现不同程度的同比下滑。少儿图书和教辅教材虽实现了正向增长，但增速相较2019年明显放缓。此外，2019年正向增长的工程技术、计算机、医学、经管、教育、大农业和自然科学类在2020年转为负增长。

中国版权产业总体规模
占GDP比重达7.39%

据中国文化报，近日，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完成《2019年中国版权产业经济贡献》的调研报告。调研显示，2019年中国版权产业的行业增加值为7.32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0.34%；占GDP的比重为7.39%，比上年提高0.02个百分点。中国版权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稳步提升，总体规模进一步壮大。

随着我国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新闻出版、广播影视、软件、广告与设计等业态加快数字化转型，推动核心版权产业快速发展。2019年中国核心版权产业的行业增加值达到4.59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0%，占全部版权产业的比重达63%，对版权产业发展的支撑引领作用更加明显。

中国版权产业稳中向好，对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发挥了重要作用。2019年我国版权产业的城镇单位就业人数为1628.60万人，占全国城镇单位就业总人数的比重为9.49%；中国版权产业对外贸易稳中提质，2019年中国版权产业的商品出口额为3653.30亿美元，占全国商品出口总额的比重为14.62%，连续多年在全国商品出口总额中的比重稳定在11%以上。

仿古景区

不能“千街一面”

据中国文化报，近年来，文博考古热、国潮风兴起，不少地方建设仿古景区发展旅游经济。在生活节奏日益加快的当下，仿古街区营造出的独特氛围很容易勾起都市人的怀旧情结，也成为颇受游客欢迎的休闲去处。但是，一些旅游景点通过仿建文物景观打“擦边球”的现象也颇受争议。

倘若仿古景区盲目跟风模仿，一哄而上，造成“千街一面”，缺乏深厚底蕴，缺少特色，导致商业和文化比例失衡，甚至与周边环境不匹配，出现违和现象。这样的仿古街区在建成之初，或许很热闹，甚至会吸引一些游客慕名而来。但久而久之，在激烈的同质化竞争下，仿古景区很容易让游客产生审美疲劳，不具有持续的旅游吸引力。因为当游客看过仿古景区后，往往就会失去再去同类仿古景区游玩的兴趣。近年来，一些一味跟风模仿、“千街一面”的仿古景区昙花一现，热闹一阵就沉寂了，造成巨大的土地资源浪费，也伤害了投资者。

建设仿古景区不能盲目跟风模仿、照抄照搬，必须科学规划，既要充分调研和挖掘当地历史文化，也要考虑周边整体环境的匹配度，走创新和差异化发展之路，建设独特景观，打造旅游精品，提高仿古景区的旅游产品、文化产品供给质量，切实满足大众文化旅游的真实需求和实际消费能力，这是建设仿古景区不可违反的基本规律。

“抖音”平台

被行政处罚

据人民网，据全国“扫黄打非”办日前通报，近期，根据群众举报线索，北京市“扫黄打非”办公室指导北京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总队对“抖音”平台进行约谈，对其传播淫秽色情低俗信息行为作出顶格罚款的行政处罚。

据统计，2020年全国“扫黄打非”办公室举报中心共接到反映涉“抖音”平台传播色情低俗信息的举报线索900余条。

全国“扫黄打非”办公室负责人指出，任何国家的法律都不容许把人的丑行、恶行当作网络流量和卖点。大型互联网平台用户数量庞大，动辄亿计，一旦有害内容公开传播，将会产生极其恶劣的影响。对大型互联网企业加强内容监管，是为了促使其在法治轨道上更加健康发展，有利于规范网络传播秩序，构建良性竞争的大环境。监管部门及时敲响安全管理的警钟，就是要提醒互联网企业时刻不能忘记内容安全的主体责任。互联网企业既要讲发展，也要讲责任。唯有正视不足、知过改过，才能匹配企业应有的发展质量、规模和影响，才能行稳致远。

(□记者 刘一颖 整理)



一部运河史，半部中华文明史

专家精解

□ 吴欣



大运河贯穿南北(资料图)

与意义性的成果。

运河学研究资料

任何学科的建立和持续发展，都必须建立在丰富而系统的资料储备之上。大运河基本文献内容极为丰富，大致可分为五类：一是专著。元代以来，河专书出现，内容涉及治河治水理论、运河河道开挖挑浚、运河工程建设维护、漕运及其管理体制、黄河与运河关系、运河区域生态环境与社会状况等多个方面。这些著作部分已经整理出版收录于聊城大学运河学研究所主编的《中国大运河文献集成》一书中，或部分收入《续修四库全书》《四库全书存目丛书》《中华山水志丛刊》中。还有很多重要典籍，作为善本书藏于各大图书馆。二是政书、类书。明清时期官修政书中包含多种运河方面的资料，如《明会典》《清会典》《大清会典则例》《大清会典事例》等，大都有河工水利、漕粮征运、钞关仓储等类目。三是史书方志。二十五史的《河渠志》《食货志》《地理志》，明清《实录》中散落着大量“治运”人物事迹及河政河务方面材料。运河流经区域的省志、府志、州志、县志、镇志、乡土志、山水志、樵关志等，总量有数百种之多，内容涉及运河修治、河道变迁、漕粮征运、城市街区、商品交换、手工业门类、河务漕务管理、民风民俗等各个方面。四是文集笔记。明清时期的文人笔记常见的有五六百种之多，其中所记多与运河有关。明清小说有些以运河区域社会为背景，某些篇章直接描写运河沿线人物世事，可以为运河研究提供帮助。五是外国史料。元代以后，亚洲各国的使者商团、欧洲各国的传教士、商人、使臣经常沿大运河往返北京与沿海港口之间，留下了大量关于运河及运河区域社会的记述。

其次是大运河档案文献。中国大运河文献档案数量巨大，完整地反映大运河决策、建设、运营的过程。据初步调查统计，现存与运河有关的档案资料共1.5万余件，还有一小部分散存于其他西方国家。国家图书馆、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天津市档案馆等也有收藏。另外，我国台湾地区“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图书馆“内閣

大库档案影像资料库”中有若干件与运河相关的档案，还有几十种大运河明清舆图流失在欧美的博物馆和大学。最后，运河区域民间文献。民间文献资料指契约、家谱、碑刻、科仪、日记、笔记、自传、年谱、书信札商业文书、日用杂书、唱本剧本等等，是大运河水利工程建设和区域社会发展的见证，也是区域民众生活基本状况的基本呈现。

运河学研究成果

从长时段来看，现代运河学研究应始于20世纪初至70年代末，本阶段成果多偏重于历史研究，且多为运河基本历史史实考证；从研究取向看，学者多着意于运河政治特性的论述。1980年—2013年为第二阶段，是运河研究的发展阶段。新的历史时期，随着学术价值观、研究方法以及研究环境的改变，大运河研究不但实现了从历史(地理)研究向其他学科研究的逐步扩大，而且研究深度和广度也发生了改变，包括史学界在内的学者重新审视以往从经济入手且带有强烈政治色彩的宏观社会形态解释模式，将研究带入新的多元视角与多学科的研究领域。运河学的研究呈现两种趋势，一是延续“漕运”研究，二是将运河放置在区域经济发展的框架中讨论其作用。此类研究的初衷或不着力于对运河与区域之关系的解读，但亦将运河作为一种因素，讨论城镇“专业化”、市场“层级化”、“区域社会的内变迁”等问题。其他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相对细化，多以人口、宗族、社区、信仰为对象，讨论不同区域的社会发展脉络与结构性变化。这类研究看似“细碎”，但实则是将触角下沉，对区域若干事项进行“剥笋”式剖析，以实现运河区域“立体”历史的整体性认识。大运河文化方面的研究则基本遵循了传统研究模式，即对运河文化进行分门别类的讨论，凸显运河文化的融合性与地域性。同时运河文化遗产保护和旅游资源开发类的研究大量增加，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产学研的结合。从表象来看，运河文化异彩纷呈，文化理论与实用性研究各美其美。第三阶段即是2014年大运河“申遗”及2017

朱子何以能判断“沧海桑田”

□ 本报记者 于国鸣

在省图书馆国学分馆举办的山东省尼山书院朱子学公开课上，厦门大学哲学系教授乐爱国在解读朱子思想时，对朱子的“格物致知”与涵养工夫进行了详细阐释。乐爱国说，朱子不仅在哲学、理学领域取得卓越成就，在农业、科技、天文学等领域，也都作出重要贡献。

朱子的科学精神体现在具体的行为中。比如，正因为对自然与农业的深刻了解，朱子写出了《漳州劝农文》；他家里还安装了浑仪，即浑天仪，用来观测天文。他还辨认出了化石，对沧海桑田的历史变迁也作出客观的判断。

乐爱国长期从事中国科技史的研究，所以对朱子关于“格物致知”跟科技的关系，也有很多心得体会。朱子在自然和科技方面的思想，在朱子本人的论述中都有清晰的体现。

朱子的思想以“格物致知”论为特色。朱子讲的“格物致知”，不仅是指提升个人道德修养方面的工夫，还包括“格外物”，即观察研究外部事物，当然包含对自然的研究。朱子曾有一段话，“天地中间，上是天，下是地，中间有许多日月星辰，山川草木，人物禽兽，此皆形而下之器也。然而形而上之器之中，便各自有个道理，此便是形而上之道。所谓格物，便是要就这形而下之器，穷得那形而上之道理而已。”可见，他是主张从“形而下”的一草一木、人物鸟兽的观察研究和体悟中，获得“形而上”的“道”的。朱子还说过一段话，“至若万物之荣悴，与夫动植之小

大，这底是可以如何使，那底是如何可以用，车之可以行陆，舟之可以行水，皆所当理也。”万物之兴衰，动植物之大小，万物皆有其理。因此，朱子无论是关于儒学经典的诠释，还是授徒讲学、待人接物，都显示出他确实拥有丰富的自然知识。

可能有人提出质疑，朱子研究仁义道德之外，还研究自然知识，这么做是不是儒家正统？其实，儒家一直是提倡和喜欢研究自然界的。《论语》中记载，孔子在教育弟子们时，曾说“小子何莫学诗”，理由之一就是“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同样是《论语》中，还记载孔子的另一句话，“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在这里，孔子是打了个比方，用自然现象来表达自己的政治主张。但是，用北辰来打比方，说明孔子对这一天文现象是非常熟悉的。甚至可以想象，孔子教学的时候，为了便于理解，会不会带着他们一起观察天文呢？孔子有没有这么做过，没有确凿的证据来证实，而朱子确实这么做过。朱子在教弟子们时，弟子们在争论，北辰到底指什么？是指北辰那个位置，还是指北辰星，北斗星？争论不决，最后有人提议，朱子家里浑仪，何不去亲眼观察一番？为了研究天文学，朱子在家里设立了浑仪，也可见他的严谨认真态度。

《朱子语类》中，记载了朱子观测得出的结论。比如，卷二十三记载朱子的话，“所谓以其所建周于十二辰者，自是北斗。《史记》载北斗有五星，太一常居中，是极星也。辰非星，只是星中界分。其极星亦微动，惟辰不动，乃天之中，犹磨

之心也。沈存中谓以管窥，其极星不入管，后旋大其管，方见极星在管弦上转。”当被问“极星不动”时，朱熹回答：“极星也动。只是它近北辰后，虽动而不觉。如那射糖盘子样，那北辰便是中心桩子。极星便是近桩底点，虽也随那盘子转，却近那桩子，转得不觉。今人以管去窥那极星，见其动起来，只在管里面，不动出去。向人言说北辰便是北辰，皆只说北辰不动。至本朝人方去推得是北辰只是北辰头边，而极星依旧动。又一说，那空无星处皆谓之辰。”

朱子对自然科学的研究，首先是他从小养成的兴趣有关。第二，和儒学所倡导的“博学于文”有关。第三，则是注经的需要。众所周知，儒家经典包罗万象，广博深奥，若无丰富的自然科学知识，注经是难以完成的任务。

在这些方面，朱子有很多创新，比如关于宇宙形成论。谈到天地宇宙起源，朱子这样论述，“天地初间只是阴阳之气。这一个气运行，磨来磨去，磨急了，便拶许多渣滓；里面无出处，便结成个地在中央。气之清者便为天，为日月，为星辰，只在外面，常周运转。地便只在中央不动，不是在下。”对于天地的形成，日月星辰的运行，阐述了自己的理解，这个观念较之前人有了明显进步。

朱子还说，“天地始初混沌未分时，想只有水火二者。水之滓脚便成地。今登高而望，群山皆为波浪之状，便是水泛如此。只不知因甚时候凝了。初间极软，后来方凝得硬。”群山因何呈波浪之状？朱子猜想，很可能山原来在水底形成，之后逐渐升高而成如今的样子。这个猜想，也是

领先于西方的。

朱子在科技方面，还有两个很重要的贡献。一是他发现了化石。朱子说，“今高山上多有石上蛎壳之类，是低处成高。又蛎须生于泥沙中，今乃在石上，则是柔化而刚。天地变迁，何常之有？”“尝见高山有螺蚌壳，或生石中，此石即旧日之土，螺蚌即水中之物。下者变而为高，柔者变而为刚，此事思之至深，可验者。”生于泥沙中的牡蛎，如今为什么在石头上？他认为这是“柔化而刚”，而且他表示，经过反复深刻的思考，这是能够验证的。而高山上为什么出现了很多蛎壳？这是因为地质变化，低处成高，沧海桑田。在这些问题上，体现了朱子不同凡响的思辨精神，科学精神。

朱熹遵循并实践孔子“博学于文”的论述，大量读书，获得广博的知识，包括自然科学知识，而且朱子做事认真，所以每做一件事都有成就，终成一位大家。朱子讲求“格物致知”，必须强调一点，格物致知与中国的科学发展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在“科学”这个汉语词没出现之前，一直是把西方的“科学”一词翻译成“格物”的，把西方数理化之类的学科都称为“格物穷理之学”。明代科学家徐光启写的《农政全书》里，就提出西方科学传入中国后都可以称为“格物穷理之学”。一直到1897年，康有为在编辑《日本书目志》时，曾将两本含有“科学”字样的书籍列入《日本书目志》一册卷二理学门中，这两本书分别是《科学入门》和《科学之原理》，这也是我国最早真正使用“科学”一词。这个“科学”，其实就是朱熹的“格物致知”。